



王国藩社的奇迹

俞文元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內容提要

王國藩社就是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演中所贊許的建明農林牧業生產合作社。本書通俗的記述了共產黨員王國藩領導着人們所說的「窮棒子社」，兇常二十三戶，十幾個勞動力和三條驢腿，堅持勤儉亦社，發展成為五百五十二戶的高穀社。經過艱苦奮鬥，創造出顯著的成績：祖祖輩輩遺留下來的干燥土地，在1956年一年中，變成了水澆地；過去千萬的廢地荒坡，現在變成了肥沃的田園；在常年產量每畝百余斤的山地上，現在豐產玉米達到了千斤；在農業技術改革上，社員們人人懂技術，幹部們个个成內行；過去一字不識的「野咕鎮」經過掃盲，達到了中、學文化水平；在社員生活上，大多數社員成了余糧戶，並趕上了富裕中農的生產水平。

本書適合農村工作幹部和農工幹部閱讀。

4

2

作者的話

建明社就是王國藩領導的所謂「窮棒子社」，以「勤儉辦社」名傳全國。

現在王國藩合作社怎麼樣了？這是全國人民所關心的一個問題。

王國藩合作社已發展成爲一個全鄉規模的五百多戶的高級社，它繼承並發揚了過去「勤儉辦社」的光榮傳統，創造出更顯著的成績：把祖祖輩輩遺留下來的干燥土地，在1956年中變成了水澆田；千萬年的廢地荒坡，變成了沃地田園；在常年每畝產量百余斤的山地上，豐產玉米每畝達到了千斤；在農業技術改革上，社員人人懂技術、幹部個個成內行；一字不識的「野姑娘」，變成了中學生；社員們比初級社時，增加的收入不是百分之几，而是几倍；生產超過了富裕中農的水平；過去愁眉苦臉的孤寡戶，現在滿面堆起了笑靨；「愛社如家」不再是口號，成了每個社員的實際行動和全社的風尚……。

這一切的變化，僅僅是這個合作社的開始。在遠景規劃里，這里將要把處處的沙荒廢地，變成樹海良田；座座的荒山禿嶺，變成花果山園；過去的窮鄉僻壤，到處將是「無山不綠，有水皆清，五穀豐登，人畜興旺」的社會主義的美麗圖景。

這里我必須說明的是：建明社所建設的業績，我很難全部介紹出來，還有待其他同志去詳細了解與報導，以使它更多地放出光彩。

最後，我還應該說明：當我對「王國藩社的奇蹟」這一

稿件進行第三次修改的時候，正是右派分子向我們的黨進行瘋狂進攻的時候，我滿懷激憤的心情，極其仇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無知和無恥。現在還是讓我引用代表着五億農民心情的王國藩的話：「我們明白：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仇恨社會主義道路，仇恨我們的黨；可是我們熱愛社會主義道路，熱愛自己的黨。我們只可惜自己用血汗換來的糧食被這些人白白吃掉，真不如多養一群笨豬。」和王國藩社的事迹來反駁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種種謬論與無恥謊言吧！

俞文元

1957年7月

目 录

作者的話

沙荒變綠海，山溝成糧倉·····	1
兩種思想，兩個主張·····	3
堅持勤儉辦社方針克服鋪張浪費思想·····	11
規定各種制度，加強社內工作·····	18
搞好增產計劃春耕播種開展勞動競賽評比模範·····	23
養豬積肥興修水利技術改革全面增產·····	29
農業為主發展多種經濟生產全社達到富裕中農 生產水平·····	42
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提高社員文化水平·····	49
美麗的遠景，幸福的山村·····	57

沙荒变綠海，山溝成粮仓

你要去河北省遵化县建明农林牧业生产合作社，問他們什么最出名？他們就会告訴你「勤儉办社」最出名。因为，这个社是「勤儉办社」的具体体现和創始者。「勤儉办社」是他們的「傳家宝」，也正由于他們一貫坚持勤儉办社，才把社办好的。

西四十里舖乡是个山多地少、石厚土薄的山区。在1952年的春天，以貧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王国藩为首的二十三戶貧农，建立了一个初級农林牧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社，当时仅有三条驢腿（因为驢是合养的，四分之一的驢属于單干农民），被富裕的戶譏笑为「穷棒子社」。在建社初期的艰苦日子里，他們不依靠国家貸款，而是严格控制开支，凭借社員的双手，在天寒地冻、大雪紛飞的冬季里，跑到离村七十里地以外的山上去打柴。从山上取回大批生产資金，用以进行农业生产。这样，在党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四年的艰苦劳动，逐步的改变了山区的貧困面貌。在解放以前，人們的生活是极端困苦的，有二十多戶常年累月的靠要飯度日，一家子沒有一条完整的旧褲子，男人出去女人在家里，女人出外时再穿上男人脫下的褲子，男人在家里光着身子。在日寇、蔣匪的压迫蹂躪下，天天处在死亡的边缘。

在1952年未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前，全村需由国家供应二十多万斤粮食，发放五万斤以上的救济粮和一百多套寒衣。可是，自从1952年成立农业社以后，粮食作物由过去的亩产一百二十斤，提高到亩产三百零五斤。到了1955年，不

仅达到了家家户户粮食自足，而且售出余粮三万多斤。一千四百亩山荒和六百亩沙荒变成了綠林；在庄北，过去是望不到头的荒沙河灘，现在已有四十余万棵長到两三丈高的小叶楊树；在六百多亩梯田里培植了果树。每当夏天，这里蔽日成蔭，綠化了山村。

从办社初期，仅有「三条驢腿」，逐年增加到三十二头牲畜，猪十四只，羊一百零三只。还有大車五輛及其他农具，共价值一万二千元。同时有四十戶社員盖起新房一百四十余間。

以上这些就是王国藩所领导的初級农业社堅持「勤儉办社」的結果。这結果也是一粒极其光輝而又幸福的种子，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心田里扎下了根子。

这个社，经过1956年的一年时间，起了很大变化。他们由西四十里鋪村的一百四十八戶的初級社，变成了四个村（西四十里鋪、东四十里鋪、白馬峪、大于溝）、五百五十二戶、二千六百五十五口人的高級社。为了保持和发揚王国藩领导的原建明农林牧业生产合作社「勤儉办社」的光荣傳統，在1956年1月正式命名为：「西四十里鋪乡建明农林牧业生产合作社」。被社員热烈拥护的、「勤儉办社」的领导者、共产党员王国藩，当选为社务管理委员会主任。

1956年，高級社建成以后，积极发展生产，繼續贯彻执行「勤儉办社」，保証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增加收入，象一条鮮明的紅線，貫串着农林牧业各个方面的工作。从春耕前的大規模地积肥、緊張的春耕播种、各項农业技术改革、艰巨的水利建設，到夏季作物一系列的管理，经过全体社員的艰苦努力劳动，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粮食作物每亩平均产量达到四百四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棉花一百八十

斤，比1955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花生二百七十斤，比1955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再加上林、牧业和副业收入，每个劳动日分紅二元八角，全社百分之九十七点八的社員增加了收入，百分之九十二的社員成了余粮戶，提前完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的产量要求。

第一个社会主义秋季的大丰收，給人們帶來的喜悅不仅是在經濟上，更重要的和可貴的是在思想上。从年迈蒼蒼的老社員向你訴說「託毛主席的洪福，成立了高級社，样样庄稼大丰收」的笑臉上；从在本县初級中學年輕姑娘的「沒有亲爱的党，沒有高級农业社，生長在山溝里的穷丫頭怎能上中學」感激的心情上；从老、弱、孤、寡「五保」戶，由过去缺吃少穿，到有吃有穿，一年強似一年的欢快的生活上，不仅使參觀的人為他們艰苦劳动、「勤儉办社」，感动得下淚，而且使你感到农村的社会主义在人們的心田上扎根、抽叶、开花，已經結果了。正象五十六岁的范楊氏所說：「高級社里沒穷人，我这寡妇也享福了。」这話确实不錯，她全年做了三十个劳动日，加上社里補助的六十元，共收入一百多元。全社的人都喜笑颜开，欢呼高級合作化好得很。高級合作化的好处使社員亲眼看到，而且是亲自尝到了。

两种思想，两个主張

在合併轉成高級社以后，有一部分社幹部和社員，特别是从鄰村社的某些幹部和部分社員，認為原建明社的一切都要从小处着手「勤儉办社」的作风，在合併成大社后仍然这样办社是「不大方」、「太小气」，有的則說：「咱們的社

党中央和毛主席都知道，高級化以后更應該象个样子；高級合作社搞的是大生产，攤子就应当摆大点，闊气些」。在这样思想支配下，对社員的一百零五头毛驢，不愿接收（即按当时市价折价入社），主張把毛驢全部外卖，換回大驢大馬；主張卖掉社里現有的鉄輪車，換回膠輪大車；主張把牲口籠头、繩繩及一切旧式农具和家具，全換上「一色新」。文教委员会主任王风仪，主張並积极張罗建立戏台，办买彩幕。总之，在部分幹部和社員中，認為不開排場就无法表现出高級合作社的优越性。当提出社里沒有錢承办这些事情时，而主張闊排場的社幹部却說：「可以向政府貸款呀」。

可是，以王国藩为首的一部分社幹部和社員，是勤儉慣了的，他們把「勤儉办社」当作自己的「傳家宝」，非常爱惜原来的穷家底；堅決反对鋪張、耍闊。因之，当时「勤儉办社」和「闊排場」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尖銳而又深刻的。下面就叙述一下这两种思想的斗争过程。

建明农林牧业高級社剛剛建成后，对于如何处理、接收各初級农业社的物资，极其鮮明的表现出两种思想，两个主張。一个是以原白馬峪村初級农业合作社主任高玉滿、大于溝村初級农业社主任于永水、东四十里鋪村初級农业社主任溫自清等人为首的占社务管理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幹部，极力主張把社里生产当前还不需要的东西，也主張折价归社。他們的理由是：「高級社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有备才能无患。」怕的是「物到用时方恨少」。高玉滿說：「高級社土地都不分紅了，农具还能私有？社里什么东西都应该准备全套的，用着方便，看着大气。」另一个是以原建明初級农林牧业合作社主任王国藩、副主任杜奎等为首的几个幹部积极主張按高級社的生产需要和当时財力可能办到的，折价入

社，其余小型农具就采取由社員自备、自修的办法解决。王国藩說：「这样办，社里可以少花一些錢，社員准会同意的。」可是，高玉滿等人則認為：「这样办法行不通，社員私有的东西，誰肯甘心情愿拿到社里使用呢？而且，这样办是明明白白的讓社員吃亏，哪能行呢？」杜奎接着說：「現在的高級社，还是过去几个初級社的那样多的土地，过去采用私有伙用的办法能行，現在还是对社員的东西用坏时修理或賠償，保本保質，既可減輕社的开支，又不損害社員的个人利益，为啥就不行呢？」

就这样，两种針鋒相对的主張、两种領導思想、两种代表社員的意見，誰是誰非，終于提到社务管理委員會的議事日程上来，在会上又展开了一番激烈的爭論。虽然王国藩等人的主張，在社务管理委員會中佔少数，但王国藩等人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在会上严肃認真而又詳細的算了細賬。王国藩等人提出，如果按照高玉滿等人的意見办事有「三費」：一是「費錢」，社里买許多不急需的东西，要花費很多錢，必然加重社員的負擔，相对的減少社員的秋后收入；二是「費房」，买很多东西就需要安置和保管，势必盖房或借用社員的房子，盖房要用很多的錢，在社員住房很紧的情况下借用社員很多的房，也会造成社員生活上的不便和不满；三是「費人」，各种东西增加很多，必然增多保管人員，这样就減少了生产力量，又增加社的开支。經過这样算賬以后，双方的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意高玉滿等人主張的人少起来了。經過反复的討論，連原来主張關排場的于永水、溫自清，也开始同意王国藩、杜奎等人的主張了。于永水說：「还是国藩的意見对，这样办，既能勤儉办社，又能适应生产需要。」經過說明理由，算清細賬，分清利害，

最后，主張勤儉办社的人佔了絕對多数。高玉滿也觉得国藩的意見不錯。但是，想到某些社員的意見，对于国藩等人的主張能否在社員中行得通，还是將信將疑。因而，提出：「你們都同意了，我的思想还未完全搞通。」並且他說：「社务管理委員會可以这样通过決議，可是我总觉得很多社員还是同意我的意見。」因此，把「鬧排場」还是繼續「勤儉办社」問題，从社务管理委員會又提到了全体社員面前。

在社务管理委員會散了以后，高玉滿怀着「一切事情由社員自己决定」的心情，回到自己当过初級社主任的白馬峪村，接着社务管理委員會的意見，召开了社員大会，說明了两种主張，讓社員加以討論决定。在討論中，除了一部分青年社員存有天真的「办高級社处处要象个样子」的思想情緒而主張鬧排場外，广大社員沒有不贊成王国藩的意見的。虽然一部分年輕人經一再劝說和解釋，还是无效。在这种情况下，特別是在社員們积极主动的报出私有伙用的农具样样俱全的事实面前，高玉滿才感到自己的主張有問題了。会后他說：「我的算盤是打錯了，我想的是 虽說小农具，社里不买，社員不会自动拿出来用，事实並不那么死巴，大家都同意这样办。」這一問題爭論的結果是：把原計劃价值五千六百七十四元折价归社的东西，只用了六百四十元就买够了社內在生产上所需要的生产工具，仅佔原計劃的百分之十一点二。也就是說，如按高玉滿等人的主張，每戶社員平均負担十元多錢；采用了王国藩等人的主張，每戶社員仅負担一元多錢了。

上述問題的解决，並沒有奠定下坚持「勤儉办社」的思想基础，而是主張鬧排場的人在群众面前碰壁后，暫时的回了头。因而，在处理社員的牲口問題上又发生了爭論。在此

區里，過去祖祖輩輩是使用毛驢進行生產，全社共有一百零五頭毛驢，是農業生產上的主要動力。為了照顧到社員搞副業和生活上的需要（如磨粉、騎驢出門串親等），計劃把六十七頭毛驢折價歸社所有，並按各原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毛驢多少和需要，確定白馬峪村折價入社十八頭，東四十里鋪村十七頭，西四十里鋪村十六頭，大于溝村十六頭。但是，以高玉滿等人為首的卻主張卖掉所有毛驢，換回大騾大馬。他說：「白馬峪村在初級社時，就花六百九十元买了一匹騾子。現在办了高級社，小驢破車，太不体面。」他又說：「至于买騾馬么！別村不买也可，我們村的各生產隊都要买。」別的村的幹部听高玉滿这样說法，唯恐自己村的生產隊吃虧，因而也主張卖掉毛驢，換用騾馬。这样，主張卖掉毛驢，換回大騾大馬的人就又佔了多數。因此，對於毛驢折價入社的工作，就採取了消极应付态度。按照計劃白馬峪村折價入社十八頭毛驢，只接收了七頭；東四十里鋪村看白馬峪村折價入社的毛驢太少，也只折價入社十頭；只有原來王國藩領導的西四十里鋪村初級農業社按計劃全部將毛驢折價入社了。因為各村沒有按照原計劃辦事，所以召開了一次社務管理委員會會議，進行了討論。在会上高玉滿說：「我的思想還是通了，可就是那些毛驢个头小、沒大勁、不能用，就是已經折價入社的七頭毛驢，也得再退回去二頭。这样，牲口就不够用了，还是得买大牲口。」並且提出：「社里如不給买，社先借給我們村一些款，由我村的生產隊去买，等秋后打下粮食由我村生產隊還錢。」王國藩等同志提出：「現在每个高級社都要全部卖掉毛驢，毛驢没人要，也很不值錢；每个社都要买大騾和大馬，價錢很貴。都不要毛驢，把毛驢卖给誰呢？都要大騾和大馬，又从哪里去买？」在討論中，逐步明

确了問題的实质，提出：「究竟是毛驢真的不中用了，还是幹部思想上有問題呢？」王國藩、杜奎等人詳細地算了賬並作了解釋。王國藩說：「大家不要抱怨我老王太小氣，原建明初級社，是由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單凭大家一雙勤勞的手起家的，正是因为这样，我們才得到了毛主席的稱贊。在高級化以後，我們繼續使用毛驢破車挖瘡套（即破旧的套，結了很多疙瘩），並不是什麼丟臉的事情，要是因為鬧排場，多花不應花的錢，反而使社員收入減少了，我們不僅辜負毛主席的稱贊和希望，准會受到毛主席的批評，那才是真正丟臉的事呢！大家想想和算算：買一匹馬或一匹驢子就要花五、六百元，可是買一头毛驢只用五、六十元就夠了。一匹驢子的錢可以買十头毛驢，一匹驢子怎么好也頂不上十头毛驢幹活呀。當然，大驢大馬比毛驢強，可是這得慢慢的來。」國藩的話是熱情動人的。這時感動得大于溝村的于永水說：「我村不願意如數把毛驢折價入社，這是思想問題，並不是毛驢不能用了。」東四十里舖村的溫自清接着也說：「我看白馬峪村沒按原計劃把毛驢折價入社的打算，是想多弄些大牲口。」在所有的幹部都檢查了思想後，高玉滿也感到自己的想法有問題，但是為了臉面關係仍然面紅耳赤的說：「別村的毛驢可能強一些，我村的毛驢可是太弱了，按計劃折價入社不行啊。」因此，其他社幹部對高玉滿的錯誤思想便進行了批評教育，然後高玉滿才慢吞吞地檢查自己的思想說：「我是有思想問題，我們打算盡量少些把毛驢折價入社，就可以多弄些大牲口，這不僅是鬧排場，還有点本位主義思想。」

散會後，高玉滿回到自己所負責的白馬峪村，又折進四头毛驢，但因有的隊幹部不願意折，就又停止了。為了徹底

貫徹執行原計劃，又召開了社務管理委員會，又進一步檢查原因，經過反復的算賬、對比，擺出利害，說明理由，才按計劃把毛驢折價入社了。

同時社員們之間也有矛盾，在當時有的社員認為勞力少、土地多，把土地無代價的入社自己吃虧；有果樹、林木的部分社員，也覺得果樹、林木入社不合算；有牲口、車輛的社員則主張車輛、牲口應作高價；可是沒有牲口、車輛的社員則主張作價從低。如東四十里鋪村社員張鐸，他的一頭毛驢，社務管理委員會給他作價五十五元，他不同意，要求作六十元。但是沒有牲口、車輛的社員，認為作價五十五元也太高。在生產基礎上，勞動力多的社員戶，主張按土地畝數負擔；而土地多勞動力少的社員戶，則主張按勞動力負擔。這些問題的存在，加上哪些東西無代價歸社，作為集體所有；哪些東西折價歸社，分期償還；哪些東西屬於個人私有的界限弄不清楚。因而，在當時的部分社員中思想顧慮是不小的。

然而我們還必須看到另一種情況，也是主要的情況，就是由於幾年來辦初級社中，對於土地報酬，所採用固定地租規定常年產量為百分之五十的辦法，使每一自然畝的租額才達到六十五斤原糧，除去農業稅後，僅剩下四十幾斤。根據這種情況看，社員的經濟來源，主要是靠勞動報酬。如原建明初級社社員王榮，在1955年（初級社時）全家共收入五百八十元，其中土地和牲口所得租價只有七十四元，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二點七。象王榮這樣的戶，在原建明初級社中，就有一百一十八戶；只有十八戶的土地和牲口的報酬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由此可見，土地報酬在社員的實際收入中降到極其次要的地位，在大部分社員中逐步削弱了對於土地的

私有觀念。這正如老社員王榮所說：「不用依靠那點土地了，就憑自己的雙手勞動吧。」這代表着絕大多數社員、特別是廣大貧農和大部分下中農社員的思想。這就可以看出，在當時是存有兩方面情況的，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大多數社員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積極開展積肥，希望轉成高級社後更多的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在一部分社員中還不關心社的事情，只顧考慮自己的土地、牲口和農具等問題。這兩種思想情況，顯然是有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存在，對於發展生產是極其不利的，且嚴重影響着貧、中農之間的團結。以王國藩等人為首的社務管理委員會，從過去幾年辦初級農業社中深刻的體驗到：必須作到互利，才能達到社員的真正自願；必須自願，才能達到鞏固團結；必須團結，才能搞好生產；必須搞好生產，才能增加社員的實際收入。為此，除緊緊抓住勤儉辦社這一中心環節和大力進行了艱巨的思想教育工作外，並突出地本着有利於貧、中農團結，又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原則，慎重的處理上述具體問題，以發揮全體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實現增產的目的。如牲口作價，一般稍高於市場的百分之十五，這是因為春季比全年平均價格低，秋季又較全年平均價格高，而稍高於市場價格的百分之十五，實際上等於全年的市場平均價。對於生產基本，採取了按勞力負擔，因為勞動力多的社員戶，必然收入增多，應該多負擔一些；勞動力少的社員戶，收入可能相對減少一些；由於土地已取消分紅，按土地負擔就不合理了。在這樣正確的處理具體問題後，貧農社員反映：「這樣處理正確，我一定好好勞動，把社办好。」中農社員表示：「我們以前總怕牲口入社作價低了吃虧，這樣作價合理，我算放心了。今後一定服從社的領導，積極參加生產。」

堅持勤儉辦社方針 克服鋪張浪費思想

經過幾次事實的教育和反復的思想鬥爭，繼續「勤儉辦社」才在社務管理委員會的所有幹部中明確起來，就連高玉滿等人也積極的主張勤儉辦社了。但是在廣大社員中，仍然有一部分人主張「闊排場」，特別是在一部分青年社員中。如社員溫自禮說：「全國各個地方都知道咱這建明農林牧業生產合作社，現在轉辦成了高級社，再使用小毛驢、破車爛套，真不體面，叫外社看見，說這是建明社的，還不笑掉牙齒？依我說換上一色新。」同時，在大部社員中，特別是過去當家主持過日子的老年社員中，都非常反對鋪張浪費。如老年社員王榮、邵慶林等人說：「照着一色新辦高級社，准辦成驢糞蛋——外面光。」社員中的兩種思想鬥爭，隨着社務管理委員會幹部中兩種思想鬥爭的發展而發展；社員中兩種思想鬥爭，反過來又影響和決定着幹部的兩種思想鬥爭。

針對社員中兩種思想情況的產生、存在和發展，以及對社幹部的影響，黨的鄉總支委員會和社務管理委員會進行了分析研究，並採取了措施。大力地正面地用原王國藩所領導的建明農林牧業初級合作社「勤儉辦社」「白手起家」的生動事實教育社員，號召每個社員繼續發揚「勤儉辦社」的精神，並通過黨、團員分工包戶向社員反復說明增產與節約的關係。通過思想工作，使每個社員懂得積極發展生產，厲行節約的重要性；使每個社員了解不能一只手生產來，另一只手浪費出去，只有增產與節約結合起來，才能增加社員

的实际收入；也只有在每个社員的实际收入不断增加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多的公共财产的积累，从而有力量扩大生产和办更多的对社員的福利事业。

同时，向全体社員普遍地进行算細賬。如通过当时市場上一匹騾子价值六百余元，而一头毛驢仅值五十元，必須卖掉十多头毛驢，才能換回一匹騾子。可是在山区的土地上耕种，一匹騾子無論如何也頂不上十头毛驢的作用，实际上在山地上耕种，两头毛驢就等于一匹騾子的效用。因而，牛、驢在相当長的時間內，特別是在山区，在沒有农业机械来代替畜力以前，它还是生产战綫上不可缺少 的极 其重要的动力。特別是由高玉滿等人用自己过去的錯誤認識，去向社員进行教育，作用就更大。这样，很快地統一了全体社員的思想。如原建明初級社社員屈恩說：「剛剛办了高級社，我只顧高兴，忘了过去的艰苦了。咱高級社这么大的家业，一不小心，稍有疏忽，就得多少錢浪費啊！还是按二十三戶貧农办社时那样兢兢业业的搞吧。」在社員提高思想覺悟的基础上，提出「繼承前建明农林牧业初級生产合作社「勤儉办社」的光荣傳統」的口号，这个生动有力的口号，迅速形成了全体社員的行动綱領。

1956年的春天，建明社緊張的春耕播种开始了，畜力不足（約缺二十头牲畜），社員們就以人力拉車、拉犁，因之提前十天左右完成了春耕播种任务。为了大力节省社的开支，社的办公用房，因陋就簡，不作大的修理。社里用的东西，凡是自己动手能做的，都是社員自己亲手制作。裝果品的和盛玉米用的大簍子，按财务开支計劃可以报銷，但各生产队是由社員自己动手編制。社員放棄农活后的休息時間，从山上割来四千余斤荆条，編出盛果品及玉米用的大簍子一千